

刘向文献编纂思想研究*

李景文

【提要】 刘向是西汉学术谱系的建构者、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奠基人。刘向父子在校理、编纂皇家藏书的过程中总结出一系列的学术理路与校勘原则,影响后世达两千年之久。本文以西汉今古文经学之争为宏观视野,以《别录》、《七略》、《新序》、《说苑》、《列女传》为具体视角,探讨刘向文献编纂思想的基本脉络与主要原则,指出集萃百家、弘扬儒学、经世致用、以史为鉴是其主要宗旨;“合于六经、阐释义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其主要途径。

【关键词】 文献编纂 古文经学 经世致用 刘向

刘向不仅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文献学家、思想家,也是西汉末年社会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作为皇室后代,面对当时渐趋衰微的国势和混乱的政治局面,他深知单从经学的角度连篇累牍地上奏疏、进封事,并不能收到悟君的效果,必须另辟蹊径。于是他充分利用在天禄阁领校中《五经》秘书供皇帝阅读的大好时机,一方面及时上奏编校好的每一部皇家典籍,并附有“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叙录,实现借书进谏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校理、编纂,对古代文化渊源流别的探寻、梳理、总结来体现那一既定时代的文化思想,追求汉文化的大一统。不仅如此,刘向还精心利用所整理的先秦典籍及汉时诸子、史家著作中的大量材料,编纂了《新序》、《说苑》、《列女传》等著述,以古代的历史事件和故事讽谏皇上,指斥时弊,直陈当时政治之得失。关于刘向一生整理、校勘、编纂皇家藏书的实践活动,学人研究颇多。但对其编纂实践所体现出的丰富的理论和思想内涵,即文献编纂思想,前人鲜有总结,后人也涉猎甚少,成为刘向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着力在经学视阈下对其文献编纂思想的基本脉络、主要观点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并指出“合于六经、阐释义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经世致用、以史为鉴”等是刘向文献编纂思想的集中体现。

一、服务皇权的意识形态

西汉末期,元、成之时,弘恭、石显等宦官专权,外戚王氏一门把持朝政,后宫之宠超越以往,政治昏暗,吏治腐败,人民流离失所,农民战争风起云涌,西汉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作为汉室宗亲、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刘向文献编纂实践与编纂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11BT0015)的阶段性成果。

《春秋》谷梁学大师、名儒的刘向,怀着对家族前途的深深忧虑,面对当时社会政治复杂与各种思想意识共存的状态,力图通过自己的学术努力,用儒家学说统一当时汉王朝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规范,真正使儒家思想成为汉帝国的意识形态,并把各家思想笼罩在儒家思想体系之下。《汉书·艺文志》记载:成帝河平三年,“诏光禄太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绥和元年,刘向去世,“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①刘向在近20年的皇家藏书编校及谏书编纂活动中,始终将“合于六经”、“阐释义理”作为评论典籍、编纂谏书的标准。他在编纂上奏给皇帝的每部典籍的《叙录》中,不仅重视对校定图书作者的生平与思想、内容及特点进行评论、考据和辨伪,追溯其源流,评判其价值,而且每每从儒家观点出发,评价典籍是否“合于六经”之得失。如《管子叙录》曰:“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②;《晏子叙录》曰:“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③;《申子叙录》曰:“申子学号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责实,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经也。”^④。刘向认为管子、晏子、申子的刑名法术之学,阐述专制主义思想和理论,充分体现了“霸王道杂之”的汉家法,有利于巩固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所以其学术思想有合于六经之处。再如《列子叙录》曰:“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⑤虽说列子是道家人物,但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形成的学术思想有助于维护西汉王权,刘向仍然肯定其有合于六经之处。至于儒家学派的著述自然就更合于六经了,如《孙卿新书叙录》,不只是认为“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的儒家思想合于六经,而且“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甚至认为“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为王”。刘向之所以高度评论儒家学术,并对儒家之外的诸家学术给予肯定,这恰恰说明了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家实际上已经大量吸收了其他诸家学说的精华。同时,《别录》以是否合于六经作为校定书籍的评论标准,也说明了刘向寄希望于借助整理编纂古籍文献的机会,用儒家思想来统一天下学术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

刘向、刘歆父子推崇经学,褒扬儒家,并认为诸子之学“亦六经之支与流裔”^⑥,皆具备补充王道、经学的价值,各家各派“相反皆相成”。在诸子百家中,儒家“于道最为高”,并自觉地以儒家为正统,这明显地体现在《七略》的内容和分类体系中。《七略》的前两略即“六艺略”与“诸子略”。“六艺略”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以儒家的六经为首;“诸子略”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亦以儒家为首。同时,还以儒家思想为标准评判各家短长,诸子思想中凡与儒家思想相悖的,都在批评之列。尽管儒家在刘向心目中至高无上,但他并未将其与诸子相对立,而是认为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都是孔子之后,可谓同出一源,“殊途而同归”。因此,对于治国平天下而言,六经之学,诸子之要,各有其功用,均不可或缺,尤其在“去圣久远,

①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1页。

② 刘向、刘歆撰,姚振宗辑录,邓骏捷校补:《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③ 《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第40页。

④ 《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第59页。

⑤ 《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第54页。

⑥ 《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第101页。

道术缺废,无所更索”的汉代,诸子的学术地位尤不可替代。昌明诸子之学,可救“道术”之“缺废”,可补经学之不足,可使六艺源远流而流长。

刘向在编纂《新序》、《说苑》、《列女传》三部谏书时,将“阐释义理”的标准贯穿始终。《新序》从仁孝义理发端,一直叙说到节智勇,可以说是对儒家基本道德观念全面而形象的昭示,尽管原书仅存1/3,我们无法观其原貌,但现存文字已基本显示了它的基本框架。现存《新序》十篇,其中刺奢、节士、义勇、善谋(上下)五篇,将这些类目作道德归类,全属刚健之德,余则以“杂事”名篇,内容以“警戒居多”^①,故而“杂事”篇之主旋律亦是张刚德。在《新序》中,刘向搜集、编纂、评说这些历史故事和事件,希望人君仁厚爱民,崇俭仗义;省刑罚,薄赋敛;举贤能,退谗佞;正身以化民,见妖以修德。如《杂事》“哀公问孔子曰”章:“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②说明庶民的力量是不可小视的,必须对他们宽厚仁爱;《杂事》“汤见祝网者置四面”章与“周文王作灵台”章中歌颂了商汤与文王的仁厚;《刺奢》“桀作瑶台”章与“纣为鹿台”章指斥桀纣追求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结果是众叛亲离。显然,刑罚赋税徭役的轻重,直接影响着政权的存亡。刘向在《新序》中还以大量的篇幅对忠良之臣和才智之士加以歌颂和赞扬。“象孔子的以德化民,关龙逢、比干的直言敢谏,孙叔敖的恕,石奢的直,邹忌的敏捷,屈原的忠贞,柳下惠的诚信,公孙杵臼、程婴的侠义,申包胥的爱国精神,苏武的民族气节,季札的仁德和信交,乐毅的明智和宽厚,……”^③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良好影响。对于那些“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的高士,刘向认为,人君也应该礼敬他们来表明人君对贤士的态度。

《说苑》取材的首要标准就是要求有“义理”可观,它的20个篇题即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等,本身就是各篇的中心议题,即作者所要表达的理念。不仅如此,而且几乎每篇开头,都有一章对该篇篇名进行深刻阐释的文字,开门见山地点明本篇所要表达的义理,带有很强的概括性、启示性与思辨色彩。其后以篇题为“义理”标准,分门别类地组织一系列相关的故事群,以渐进的、层层展开的方式解说“义理”。如《臣术》篇的第一章“人臣之术”,即总论本篇义理:“人臣之术,顺从而复命,无所敢专,义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故其身尊而子孙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夫荣辱者,祸福之门也。”接着进一步解释“六正六邪”的12种人臣操行:“六正”即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六邪”即具臣、谀臣、奸臣、馋臣、贼臣、亡国之臣。贤能之臣处于“六正”之道,不走“六邪”的歪路,所以,活着时被人称颂,死之后被人思念。其余各章材料,基本上就是围绕这条“义理”展开的,形散而神不散。^④《说苑》20个篇题,除《谈丛》篇实为我国最早的“名人名言录”外,剩余各篇均采用了上述这种“阐述义理”的方式和方法:先总述篇题——每篇的第一章或前几章,后分述篇题——后续的各章。可谓历数古今事,从君道、臣术一直叙说到治国方略,全面系统地表达了刘向的社会政治思想:“以儒家‘不忍人之心’的确立,作为区分王霸政治的根

① 黄震:《黄氏日记》,见赵治让撰:《新序疏证》,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321页。

② 刘向撰,赵仲邑注:《新序详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9页。

③ 刘向撰,赵仲邑注:《新序详注·前言》,第11页。

④ 孙秀东:《刘向〈说苑〉的编纂特点和艺术特色》,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论文,2006年。

本标志,以‘反求诸己’的自我修养,作为王道政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以‘民本’、‘至公’作为王道政治的理想。”^①

《列女传》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单独提出来,确定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规定妇女的日常行为准则,系统地表达了刘向的妇女观:严格男女之礼,反对女主干政,遵从三纲与儒家伦理观念。刘向在《仁智传》之“魏曲沃负”篇强调:“君臣、父子、夫妇三者,天下之大纲纪也。三者治则治,乱则乱。”^②在《母仪传》之“邹孟轲母”篇中,借孟母之口提出:“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故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③

强调君、父、夫为上为天,臣、子、妻为下为地,前者永远处于支配地位,后者应绝对服从前者。《列女传》中收录了不少恪守礼仪的女子,如赴水而死的齐杞梁妻,避嫌远别的齐孝孟姬,不肯避火的宋共伯姬等,个个守礼一意,至死不二,刚强义烈。刘向要求妇女行义遵礼,但当义与礼发生冲突时,又认为礼可以变通。《列女传》中有许多奇节异行、通才卓识而又果于行义的女子,虽说用传统的礼来检验她们的言行举止,是不符合标准的,但刘向却给了她们很高的评价。如赞美《贤明传》中的陶荅子妻:“能以义易利,虽违礼求去,终以全身复礼,可谓远识矣”^④;赞誉“齐相御妻”、“齐管妾婧”的“匡夫”美德等。刘向还希望“妇女以色亲,以德固”^⑤,对美于色、薄于德的女子深恶痛绝,强调女子应培养德行。

综上所述,将《新序》、《说苑》、《列女传》三书结合起来,从多个方面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思想知识体系,完整地表达了刘向的伦理道德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彰显了刘向企图用儒家思想指导社会政治、规范人们日常行为,使儒家思想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再现盛世的美好愿景。

二、探寻先汉学术的历史考辨

刘向、刘歆校理皇家藏书20余年,不仅使杂乱无章的简帛书有了定本,而且创造性地编纂了《别录》、《七略》。二书的编纂,不仅梳理了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及亡秦战火后幸存的上古三代至西汉间存世的典籍,而且理顺了每一书的篇章、学派归属及形成的来龙去脉,理清了每一作者的生平事迹与思想渊源、每一学派的历史源流与发展脉络。正如班固所言:“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⑥章学诚所论:“校讎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⑦由此观之,《别录》、《七略》不仅是一部综合性的图书总目录,而且也是一部简明的先秦至西汉学术史。

① 高立梅:《理想与现实的调和——刘向〈说苑〉政治思想述评》,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4期。

② 刘向:《古列女传》卷之三,清道光五年(1826)扬州影樵重刊本,第15页。

③ 刘向:《古列女传》卷之一,第12页。

④ 刘向:《古列女传》卷之二,第9页。

⑤ 刘向:《古列女传》卷之二,第1页。

⑥ 《汉书》卷一百下《叙传》第七十下,第4244页。

⑦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讎通义通解·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1. 编纂《别录》，叙述学术之源流

刘向校理皇家藏书，最初的分工就非常明确：刘向编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编校兵书，尹咸编校数术，李柱国编校方技。每校完一书，编定缮写后，“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写出叙录。其实，古人自撰序文，或为他人之书撰序文，早已有之。至于校理群书而撰叙录，自刘向始，从此开解题目录之先河。刘向所写的各篇叙录，一般包括如下内容：说明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作者生平行事、书名含义、著作原委及书的性质，辨别书的真伪，评判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确定书的价值等。其大要也如《七录序》所言：“论其指归，辨其讹谬。”^①仅从留存的诸篇《叙录》来看，足见刘向是非常重视对学术流派和学术源流的考辨工作的。换言之，重视对学术流派和学术源流的历史考辨是刘向《别录》蕴含的重要思想之一。以《孙卿新书叙录》为个案，该叙录当为刘向《别录》仅存最为完整的极少数篇章之一，仔细分析，便可知《别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梗概。

第一，“条其篇目”。叙录首题“《孙卿新书》十二卷三十二篇”，接着详列三十二个篇目，这是《别录》每篇叙录必备之体式，首载之内容。“定著三十二篇”，是刘向对不同传本《孙卿书》整理的结果，《叙录》中所载“所校讎中《孙卿书》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可证。古书篇卷不相联属，多以一事为一篇，往往每篇别行，易于凌杂，刘向编校时，合中外之本，删除重复，定著若干篇，列于叙录之前，可以防散失，免错乱。其实，古书在流传中多有散佚，后人不能尽见，往往引以为恨，如清人章宗源、马国翰、严可均、姚振宗等辑佚《别录》以济其穷。“凡有篇目可考者，望文而知其义，则各归之本篇。其无可考者，则以所出之书为次序，亦或意为先后，文义凌乱，无复条理。使目录皆著篇目，则无此患矣。”^②

第二，论考作者行事、时代。如《叙录》曰：“孙卿，赵人，名况。”与邹衍、田骈、淳于髡等人同在齐宣王、威王时的“稷下学宫”游学，同各个学派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曾“三为祭酒”。李斯、韩非都是他的学生。后到楚国，得春申君器重，两为兰陵令，其智慧、才干可与伊尹、管仲齐。“孙卿卒不用于世，老于兰陵。”“《史记·荀卿传》，寥寥数语，且不载其名。《荀子书录》则云名况，且增益至数倍。”^③此外，《别录》论考作者时代，还有其他方式：其一，或作者生卒不详，或不知作者，则考据其著书的时代。如《战国策叙录》云：“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④；其二，或不知作者时代，则取书中之所引用、后人之所称叙，著录其与某人同时，或先于某人，或在某人之后，以此参互推定。如《墨子叙录》推导出“墨子者，在七十子后也”^⑤；其三，凡撰人事迹有传说者，则考据他书予以辩证。如《邓析叙录》记载“邓析被子产所戮”事，多见《荀子·宥坐篇》、《吕氏春秋·离谓篇》、《说苑·指武篇》诸书，故刘向运用《春秋左氏传》的材料进行考辨，得出杀邓析的是驷歃，非子产的结论，引证翔实，说理透彻。

① 阮孝绪：《七录序》，见释道宣撰《广弘明集》卷三，见《四部丛刊初编·子部》第11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据明刊本影印，第36页。

②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33页。

③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42页。

④ 《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第32页。

⑤ 《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第64页。

第三,论考作者学术流派。《荀子·大略篇》云:“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①刘向在整理群书、撰写叙录时,凭己之才识、博学、平心,全面考论每一书、每一作者的学术源流,指陈利弊,不没所长,使其拥有了比较合适的归属。如《叙录》云:“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孙卿后孟子百余年,以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以非孟子”;他认为“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然后终莫能用,而六国之君残灭,秦国大乱,卒以亡。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可见,孙卿属儒家学派无疑,且为大儒。其与孟子“两家论性一善一恶而已,可知其通乎学术。”^②等等。

由以上分析可知,《别录》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书目解题,不但为随后刘歆编纂《七略》,对学术进行系统分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直接为后世学者编写书目解题或书籍评介提供了一种范式。

2. 撰成《七略》,条别学术之流派

刘歆总结其父刘向编校皇家藏书之成就,并在其《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七略》。《七略》的分类,不是主观认定的标准,而是反映了学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发轫于先秦,像《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篇》、《吕氏春秋·不二篇》等文字,诚可谓在这方面的先驱之作。司马谈撰《论六家要指》,则第一次对先秦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分类。刘向、刘歆父子的典籍分类有别于前贤,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但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思想分类即诸子学术分类,而且是对先秦至西汉存世的所有典籍的全面而系统的分类。

《七略》分类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第一,首创书籍六分法。《七略》所分书籍类目,由“删其要”而成的《汉书·艺文志》可知,“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它将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门类。三十八种实为《七略》六大门类之下的三十八个小类;小类之下又有家,《七略》共分书籍为六百零三家,家下即为具体的书名。《七略》六分法已经超出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学术分类范围,司马谈的学术分类之限于先秦诸子学术,而刘向、刘歆的学术分类则是在诸子之外又划分了五大类,因此说它是一种囊括了各种学术于其中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分类。《七略》除《辑略》为全书的总序外,其他六略下各有大序,三十三种(除《诗赋略》之五种)下各有小序,总序一大序一小序构成一种学术网络,详细勾勒了先秦至西汉时期幸存全部典籍、每略典籍、每种典籍的学术思想、流派、源流之演变图。这种分类,最大的特点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如《六艺略》诸家小序,分别考证了各家形成、流传的过程,尤其是对汉兴以后《书》、《诗》、《论语》等的阐释、传授、受重情况叙说的最为详备。《书》学源自伏生,伏生传晁错、张生、欧阳生,……在西汉构成经学博士系统,孝宣时,欧阳《书》学及夏侯胜、夏侯建的大小夏侯《书》学,被立为博士。^③传《诗》者四家,齐诗、鲁诗、韩诗、毛诗,齐、鲁、韩三家皆立于学官,毛公所传《诗》学与前三家不同,被看作是古文《诗》学,加之“河

① 荀况撰,杨倞注:《荀子》卷十九《大略篇》第二十七,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512—516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版,第604页。

② 孙德谦撰,张尔田序:《刘向校讎学纂微·序》,见杨家骆主编:《古今图书集成续编初稿·经籍典》(续21典),台湾鼎文书局民国51年版,第34页。

③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六,第1969页。

间献王好之”，未得立。但汉代以后，三家《诗》逐渐失传，反倒是私相传授的毛《诗》一枝独秀；传《论语》者两家，齐《论语》和鲁《论语》，王阳、夏侯胜、韦贤、鲁扶卿、萧望之、张禹，皆名家。古文《论语》为鲁恭王坏孔子宅壁而得，经学博士孔安国为之作训诂解说，但没有得到流传。正如目录学家余嘉锡所说：“《汉志》于六艺九种，只叙圣人述作之意，而不参以论断。次叙传授之渊源，于古今文及诸家传注，颇著其善否。”^①

关于诗赋的源流地位，据《诗赋略》大序的阐述得以推寻。《七略》或《艺文志》认为：歌诗和辞赋皆是战国以后的《诗经》，是古诗和诗教的流裔。赋诗言志，可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而“礼崩乐坏”之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孙卿、屈原等“离谗忧国”之士的赋作“咸有侧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扬子云等人，“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直到汉武帝立乐府到各地采集歌谣，于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教传统才得以恢复。《七略·诗赋略》的著录正是这一流变的写照，先著录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等四赋作，以明古诗流衍为赋的情形；再著录汉高祖刘邦以来的天子、诸侯、贵族及吴、燕、邯郸、齐、淮南、京畿、河东、洛阳、河南、周、南郡等地的乐府歌诗，以明雅、颂之作与“采歌谣”、“观风俗”制度的重建与兴盛。

小序、大序的功用，已经清楚地展示在上述的具体阐述之中，不言而喻，总序《辑略》即是对各种书籍的学术流派的总的说明。《辑略》从学术角度把六略的书分为若干流派，并对每一流派，就其来源、演变、流弊进行考辨，加以描绘，实际上它就是从学术源流演变角度来分论各种书籍的学术流变史。

“互著”、“别裁”的著录变通条例。由于同一书籍内容的复杂性，《七略》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时采用了变通的条例，即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归纳出的“互著法”和“别裁法”。“互著”即根据学术渊源把一书同时著录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类目内；“别裁”即指把一书内的重要部分或篇章裁出，著录在相关的另一类目里面。关于刘歆《七略》中“一书两载”的现象，是运用了“互著”、“别裁”的著录方法，还是著录重复未被发现？学界始终争论不休，笔者拙作《“互著”“别裁”起源时间考辨》（《图书情报工作》2012年第7期）可供参考。

第二，提出“诸子出于王官”理论。刘氏父子研究诸子百家之学，非常重视学术发生的历史根源，他们在对《七略·诸子略》各家小序的学术起源考述时，不仅将战国以来盛行的诸子之学分成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而且提出了“诸子出于王官”的理论。《诸子略》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② 刘歆采用“先言其学之所自出，此明其所长，而终言其弊”的模式，考辨诸子百家之学术，“其言皆深通乎道术之源，而确有以见其得失之故，殆无一字虚设”。^③ 显然，是把诸子百家之学纳入到了《六经》的学术体系之中，并肯定各流派的学说皆是上古王官之学在某一方面的发展，对古帝王之道都有所得，

①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五《目录书之体制三·小序》，第62页。

② 《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第99—101页。

③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五《目录书之体制三·小序》，第64页。

但它们在传承过程中也都有其流弊。“如果说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以六家分类诸子主要是通过辨章诸子学术而成的不易之论,那么刘氏‘诸子出于王官’论则主要是通过对诸子(即‘十家九流’)学术考镜源流而形成的一个重要成果。”^①与刘歆“诸子出于王官”论相悖的是刘安《淮南子·要略篇》在讨论百家学说起源时提出的“因时偶变”说,以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这两种观点,在近代的学界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章太炎、梁启超、冯友兰诸先生依刘歆说,强调学术的历史根源,使人重视思想渊源的探讨;胡适先生则依淮南说,强调一种学说的产生出于环境的需要,使人晓然于学术与时代的关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刘歆在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同时,还提出了“十家九流”的诸子学术分类,并肯定了十家九流学术各有所长。虽说刘向、刘歆“十家九流”的分类是在司马谈六家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对六家本身的排序上则与司马谈不同,《七略》前六家的排序是儒、道、阴阳、法、名、墨。九流以儒家为首,自然体现了刘向、刘歆的儒家本色。所以说,刘向、刘歆“十家九流”的诸子学术分类,不仅仅是肯定和补充司马谈关于诸子学术已有的六家分类的思想和方法,重要的是它出于治政的需要。很显然,在刘氏父子看来,只有确立“诸子出于王官”、是“六经之支与流裔”,把诸子之学真正纳入到六经的体系之中,才能打通“罢黜百家”所形成的经子融通的理论壁垒,积极吸取诸子百家学术之所长,拓宽儒学领域,丰富儒家治政理论,从而实现巩固刘氏王朝的汉代中央集权制的目的。

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是我国目录学的开山之作。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之《原道篇》、《宗刘篇》中,高度评价了刘氏父子的开创之功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而对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雠宗旨尤为赞许,视之为校雠之精髓。他说:“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中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级数之需,亦已明矣。”^②

其实,《别录》、《七略》的编纂与古文经学家一样,抛弃了今文经学家的宗教神秘主义,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作为经学家来说,刘向、刘歆父子的世界观依然桎梏在神学的藩篱里。……不过他们在文献整理的专业上,却表现出背离神学的趋向,而从人事的演进来考察学术史的发展。”^③这点在他们叙述诸子思想的起源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刘向、刘歆父子在评述学术史的演变时,首先认为学术思想是人的创造,不是神的恩赐,摆脱了阴阳灾异思想的束缚。然后在考察先秦、秦汉诸子学术时,将起于孔子之后的诸子学派的学术思想分为十家九流,并指出他们都出于“王官”。用现在的观念看,刘氏父子《别录》、《七略》对诸子学派学术思想的分类是不科学的、对诸子各派王官归属的说法也缺少充分的史事依据,但其确实抛开了今文经学的宗教神学思想,体现了人文主义观念。

三、追求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

刘向具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他一生不停地为刘汉政权寻求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尤其是元、成

① 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293页。

②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卷一《原道一》,第4页。

③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54页。

之际,面对外戚宦官混乱朝政,成帝本人沉迷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刘向的忧患意识分外强烈,以其正言极谏知名于世。曾巩在《说苑序》中曾高度评价刘向“数困于谗而不改其操”^①,他敢于同宦官(弘恭、丕显)、外戚(许、史)等奸佞之臣作不屈的斗争,尽管付出了一次次被免官、下狱的沉重代价,他始终关心朝政,心系天下,把上书、封事、著述当作劝谏皇帝、治国安邦的方式。

《说苑》、《新序》、《列女传》三书可视为同一类著述。《列女传》的编纂,即是刘向晚年与外戚斗争的一个表现,刘向以“兴国显家”、“孽嬖乱亡”的女性为对象,“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②,叙述“《诗》、《书》以来,女德善恶,系于家国治乱之效者”^③,并“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于屏风四堵”。^④亦即将国家的治乱兴亡与妇女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考察妇女的政治作用。如周室三母“太姜、任、姒,文武之兴,盖由斯起”^⑤;如殷纣王妃妲己。“妲己配纣,或乱是修。纣既无道,又重相谗。指笑炮炙,谏士刳囚。遂改牧野,反商为周。”^⑥《新序》、《说苑》的编纂,“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说”。^⑦《新序》一书“远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来,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⑧;“《说苑》一书系刘向分类纂辑先秦至汉初史事和传说,杂以议论,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点为主旨”^⑨,刘向博采上古三代先秦至汉初传记行事,借以褒贬政治得失,阐发兴亡成败之理,“其指归皆出于劝善惩恶、冀扶世教,”^⑩极论政治问题。《新序》主要论治国之道,包括统治者如何用贤纳谏,如何爱民戒奢,如何修己正身统领天下等;《说苑》主要论道德伦理思想,包括为君者如何修身治国,为臣者如何履行职责,为民者如何修己而后从政等。三书在基本内容上各有侧重而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表达方式上,其最大特点就是“储事达意”,即通过一个个短小的历史故事叙事说理,来表达作者的思想与观点。其中蕴含的政治理念、思想价值极为丰富,现择要概括如下:

其一,劝谏人君从昏聩中醒悟,勇于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刘向从政的年代,仅宣帝在位的岁月,称得上是中兴时代。元、成时期,宫廷内部权力错置、政治失序,使得“帝王之道日已陵夷”。^⑪刘向深知其严重后果,心急如焚,他出于历史的责任感,指出成帝“失御臣之术”^⑫,警告成帝“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⑬。

其二,劝谏人君要以民为本,对人民宽厚仁爱,薄赋敛,省刑罚。刘向在《新序》、《说苑》、《列女

① 刘向撰,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附录·说苑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46页。

②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第六,第1957页。

③ 刘向:《古列女传·王回序》,第1页。

④ 徐坚等:《初学记》卷二十五《屏风》第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99页。

⑤ 刘向:《古列女传》卷之一,第5页。

⑥ 刘向:《古列女传》卷之七,第2页。

⑦ 朱一新著,昌鸿儒,张长法点校:《无邪堂答问》卷四,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61页。

⑧ 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第十一《新序目录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7页。

⑨ 刘向撰,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前言》,第1页。

⑩ 刘向撰,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附录:黄震黄氏日抄》,第639页。

⑪ 《汉书》卷十《成帝纪》第十,第317页。

⑫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第六,第1958页。

⑬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第六,第1951页。

传》中辑录了许多古代轶事、寓言和传说,告诫人君,施行“宽惠爱民”德政的重要性。他在《说苑》“齐桓公问管仲曰”章中,借管仲答齐桓公问,强调敬天神不如重民意,民心向背对王朝的存亡安危至关重要。刘向为此提出:为政必须宽惠养民,视民如赤子;赋税、徭役切勿横征暴敛;切莫肆意动用刑法,要体恤爱护百姓。

其三,劝谏人君要举贤任能,知人善任,优化统治机构。刘向在编纂的《新序》、《说苑》中,采用大量篇幅记载了任人唯贤、用贤则兴、不用贤则亡的历史故事,从多个方面劝谏人君要以贤才为重。刘向认为,为君之道在于知人,知人才能善任。《说苑》“当尧之时”章,尧之所以“王天下”,重要的是他不仅“知九职之事”,而且了解“九子”的智慧和才能,做到了知人善任。刘向在《新序》、《说苑》中,记录了大量被历史记忆、被百姓赞颂的人和事。在用人标准上强调:人君用贤,要知其所长,用其所长;选贤任能应做到“外举不避讎,内举不回亲”。

总之,《新序》、《说苑》、《列女传》涉及人君治国的方方面面,正如徐复观所说:“政治问题,是西汉知识分子思想的主题。以刘向的家世及其遭遇,他的思想是始于政治,终于政治,乃当然之事。刘向的政治思想,有由其及身遭遇而来的针对现实的一方面;有由其学识恢宏,志行纯洁,因而突破现实限制,所提出的理想性的一面。”^①

(作者李景文,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研究馆员;邮编:475001)

(责任编辑:姜 芃)

(责任校对:刘 军)

^①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